

战地日记

著老写

耄耋自画

龙实耄兵自画

故色

历有事亲有声



龙实著

战地日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地日记 / 龙实著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2 ISBN 7-5356

I . 战... II . 龙... III . 革命回忆录 - 中国 IV . 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9289 号

责任编辑 颜新元

责任校对 徐盾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火焰开发区 4 片)

电话 0731-4787581

邮编 410016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化工地质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20

印张 11

版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书号

ISBN 7-5356-1762-X/J·1651

定价 28.50 元

装帧设计 颜新元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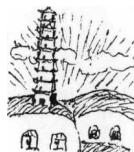
前言	1
曲折的道路	3
陌生的土地	4
逃难途中	8
在游击队的日子	15
一波三折到延安	23
敌后抗战日记	27
到敌人后方去	28
火种不灭	42
开辟新天地	48
重返鲁南	80
奇遇	92
沂蒙山反扫荡	115
在滨海区	126
走向胜利	146
较量	160
片语息风波	160
第一课	164
南下	173
紫石英号	176
在上海	186
睡地板住洋房	186
我认识一个俘虏兵	189
三双鞋子	195
男大当婚	197
斯人也，斯画也，斯文也	201
画龙	206
后记	211
编者的话	212

这些，是我一生中亲身经历、最难忘的事情。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我们这个受尽屈辱的文明古国从阵痛中走向新生的年代。我在那些烽火中度过了十一个年头，足迹踏遍半个中国。

能为祖国的新生，奉献我的青春，我是幸运的，也引以为豪。今天的年青人不会再有这样的际遇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是，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曲折的道路



我在广州市读广雅中学那几年，国难深重。我参加过一个读书会，常常阅读进步书刊，讨论国家大事。逐渐有一个认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中国的曙光在延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次日，这一震撼人心的消息传到课堂，顿时，课堂哗然，课上不下去了。

这一天，读书会的好朋友莫燕忠告诉我，他接到一位同学的延安来信，我们深受鼓舞，于是下决心奔赴延安。约同学关夫生、黄巩基、刘仕俊、李显仁、伍朝波同行。

1938年元旦，凭一颗赤诚的心，一本全国地图作向导，我们上了路。



陌生的土地



北方的天气寒冷，我们是知道的，但估计不足。我们不愿穿臃肿的棉衣、棉裤，更不喜欢老大笨重的棉鞋（广州也没有卖的），每人仅仅添置了毛衣和棉毛裤，以为这就足够御寒了。从武昌渡长江到汉口时，江风凛冽刺骨。从郑州去西安，是乘的闷罐车厢，一无座位，二无暖气，一双脚还时刻不离冷冰冰的钢板，车外冰天雪地，冷得双脚麻木，完全失去了知觉。生平第一次尝到北方严寒的滋味。

到了西安，好不容易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我们被安置到安吴堡八路军青年训练班学习。我们的志愿是进

抗大，延安去不成，虽然感到遗憾，但还是欣然同意了。

安吴堡青年训练班位于西安以北的泾阳县。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村不村，镇不镇的。自从去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的爱国青年，那儿闹得热气腾腾，就出了名，名载史册。

我们是插班生，一到就分散编班学习。

寒冷的威胁并未过去，接着又为言语不通伤脑筋。那



时，我们的普通话，即使应付日常的生活对话都很勉强，思想交流可不行。对各地方言、乡音，更感头痛。记得讲第一堂课，是一位操上海口音的教师讲“政治经济学”，接着

又不知是什么地方的教师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位来自江西的红军讲“游击战术”，都带有浓重的乡土口音，很不好懂。到了晚上开小组会，南腔北调，我几乎成了聋子，别的同学也差不多。怪不得李显仁、伍朝波只到了西安就向后转了。同行的下五个人。不久我得了毛病，不得不向木请假，到西安治燕忠等四人坚持到

我独自在西安客栈，到医院看门诊诊断，我因寒冷而得了风湿病，一种怪病：双脚冷到麻木时，反而发热疼痛，痛入骨髓，夜夜失眠。

那时的古都西安，大多是瓦房。漫天黄土飞扬，遮天蔽日，乌鸦特别多，不但天上飞，还满街走，人们也习惯穿黑色的服装，一眼望去，人群、乌鸦，黑压压、昏沉沉，给人一种阴郁感。

记不清过了多久，我的病逐渐好转，正打算重返青训班继续学习，一天，莫燕忠到小客栈找我，说那一期训练班已结业，因延安的吃住一时有困难，只有一小部分幸运儿能去延安深造，黄巩基是其中之一，刘仕俊、关夫生暂

七个人只剩
也因脚冷出
班主任胡乔
病，只有莫
毕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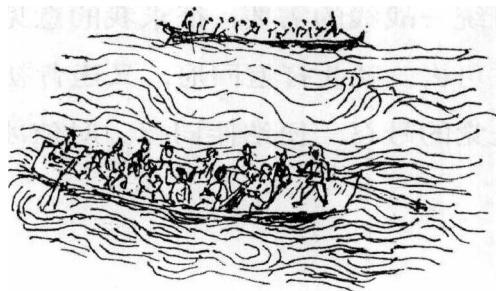
治病，住小
诊。经医生



时回广东去了(后来又重返陕北读陕北公学淳邑分校)。学校动员其余的人报考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说这是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征求我的意见，去不去，当时没有地方可去，就此打道回府，又违背初衷。心想，考民大既然是党的号召，便结伴同行。时值冰封雪飘的二月中旬。



逃难途中



8

东出潼关，北渡黄河。

黄河渡口，风大浪急，恶浪翻滚，渡船在急流旋涡中迂回前进。

我们考进了晋南民大曲沃分校。阎锡山任校长。他想网罗青年为他个人效忠，学校的公共场所，只挂他的肖像。这个地方军阀，臭名昭著，本来没有号召力，大批青年涌向民大，其实是共产党应阎锡山的要求，大力协助动员的结果。

民大分校匆匆开办，工作未曾就绪，学生到校一周，还没上过一堂课，倒是露天演讲天天不断。任何人都可登台，言论五花八门，争论不休。正在乱纷纷，吵嚷嚷之际，北面的天然屏障——中条山失守，不得不紧急迁校，打算到

陕西省另选校址。愿意去延安的可以去延安。

那时，交通很不发达，运输工具主要是骡马大车，自己的行李自己背，谁没有几十斤行李？背不动的只好就地贱价处理，多半忍痛抛弃，所谓搬家，实际上是逃难。

大搬迁的队伍，像逃难的难民似的，经过运城等五个县，到达黄河东岸的吴王渡口，以为接着便是顺利渡河，想不到，黄河被封锁了，真的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处境危险。

为什么封锁黄河？一说是，这反映蒋介石和阎锡山有



矛盾，一说是切断退路，好让前线将士下决心背水一战。

民大本来就是一个大杂烩的学校，内部争斗激烈，到了危急关头，不是同舟共济，而是互相拆台。在人人担惊受怕的时候，流言四起，说某某负责人是汉奸，某某是日本特务，某某只顾个人逃命，已不知去向等等，最糟糕的是，传说日寇的追兵已逼近，一时人心大乱，群龙无首，队伍陷入无人指挥的无政府状态。第二天，一锅米饭还没等到煮熟，就被抢光了。

“过河！过河！”

当时大家只有这一个共同愿望，人人背上行李，蜂拥到渡口等待，多么渴望对岸有船开过来啊！



那一段黄河，地处汾河口，河道特别宽，迷迷蒙蒙，看不到对岸，只见大大小小的浮冰随着混浊的河水向南匆匆流去，一群群大雁排队低空飞翔，鸣声不断，雁群真多！仿佛那里是大雁的故乡。

从早到晚，苦苦等待。盼望，失望。失望了，仍然抱着一线希望。

天公不负有心人，到黄昏时，果然对岸有船开来，一条、两条……许多条。由远而近，由模糊而清晰。是接我们的，没错，有救了。“乌啦！”

情绪多么激动，欢呼声，歌声，响彻云霄。

船一条接着一条靠近，看清楚了，原来是满载兵士的运兵船，不是空船，大家又高呼：“欢迎弟兄们上前线打鬼子！”不管怎样，有船就能过河，仍然歌声、口号声不断，不等到船靠岸，有人迫不及待地跳下水，抢先上船，接着“扑通！扑通！”顾不得水冷刺骨，一个个争先恐后，半身湿淋淋地爬上船去。先上船的人正得意，但想不到士兵们用枪托向他们猛推猛打起来，怎么啦？不是中国人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又是高呼口号，挨打尽管挨打，有许多人还是挤上了船。



我和莫燕忠总觉得这太不成体统，没有上船。没想到船没有靠岸，骚乱了一阵子，一条接着一条，又都开回对岸去了，把少数“不够勇敢”的人，孤零零地留在河边，河滩上到处是丢弃的行李。

天黑了，不走运的人，情绪懊丧，背上自己的行李回到宿营地。我和莫燕忠在街上随便买了几个馍馍充饥，吃完就倒在草铺上计议下一步的行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谈着谈着，朦胧入睡。



第二天醒来，听到街上人声鼎沸，出门一看，原来上了船的人，又都出现在眼前。打听之下，知道船上的士兵也到了吴王渡，上过船的人空欢喜一场，白挨了一顿打。

在民大编班，我们一组十个人，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大、中、小学生都有，大多来自青训班。谢恒是其中年纪较大的一个，是留日学生，爱抛头露面，一口湖南腔，总是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就在士兵上岸这一天，他混到兵营里和军官拉上了关系，回来说，渡河的这个部队是专门开到敌人后方去打游击的，原属杨虎城将军旧部177师，大队长是才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说起来还是和他先后同学呢，两人一见如故，说大队长有意动员我们参军。我和莫燕忠表示，设法渡河去延安，不愿参加国民党的部队。他说队长欢迎我们去参观，看看又何妨。



大队长黄革非，不过三十上下年纪，戴金丝眼镜，长得英俊、潇洒，谈笑风生，穿军服不像军人，不如说，和我们一样，也是个学生。他给我们介绍这支部队的政训处主任，名字叫吉致瑞，穿便服，是对河合阳中学的教师，和黄革非有深交，是临出发时才参加这支部队的，随他一块来的还有两个看上去非常憨厚的他的学生。吉致瑞不多说话，笑口常开，和蔼可亲。

大队长很有感慨地对我们说：“左右做人难啊！国民党说我们的部队赤化了，共产党又怀疑我们中间有托派。”

他让我们看他的书箱，里面装满了马列著作和延安用